

潘懋元 著

[illegible]

教育家文存

潘懋元卷

中国教育史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理应对全人类的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教育确实不为世界教育进步贡了巨大的教育思想、管理智慧和制度教育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大成就；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改革成就和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并将今后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记载历史、研究现实、把握未来，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教育史》。希望《中国教育史》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思想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做出贡献；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改革成就和新时期的教育家。我国一大批教育专家学者上下求索、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持续注入新活力。为了记载历史、研究现实、把握未来，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教育史》。希望《中国教育史》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思想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做出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懋元 著

中国教育家文存

潘懋元 卷

教育家文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潘懋元，1920年8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进修。曾任厦门大学教务处长、副校长、顾问、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建人。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高等教育学讲座》，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上、下），构建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基本框架。他还创办并主持了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在多年的工作和研究生涯中，他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并于1999年获英国赫尔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由挪威奥斯陆大学比较教育教授阿里·谢沃撰写的《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的英文版传记于2005年10月在挪威发行。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潘懋元卷》	潘懋元 著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	杨福家 著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周远清卷》	周远清 著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成卷》	纪宝成 著



潘懋元先生近影

丛书主编

袁振国

丛书 序言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理应对全人类的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也确实不断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改革成就和新时代的教育家。我国一大批教育专家学者上下求索、大胆实践，为教育发展出谋划策，为教育改革殚精竭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直接推动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并将对今后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记载历史、研究现实、把握未来，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希望《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新思考提供滋养，推动教育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编者

2005年10月

代前言

潘懋元 教授
访谈录

袁振国教授(以下简称袁):潘先生,您长期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工作,后来,您又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您主编的我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教材,至今仍然是大学、研究生的主要教材。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都是您率先提出并作出深刻阐述的。现在您虽年过八旬,可是仍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时刻关注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不断有深刻而且犀利的文章问世。首先,我想请您谈谈对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的看法。

潘懋元教授(以下简称潘):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高等教育有了—个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主要是数量上的增长,使我们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国。20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三或者第四的规模。超过了俄罗斯之后,比我们规模更大的就只有美国和印度。20世纪90年代末,又超过了印度。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可以说,我们是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一大国。现在美国的大学生有1600多万,我们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就接近这个数字,加上成人高等教育和网络学校,我们高校的注册学生达到2000万,远远超过美国了。

但是,高等教育的大国不等于高等教育的强国。我们不仅要成为高等教育的大国,而且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现在大是大,但是不强。现在还很难说我们有哪些大学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最近英国的一个排行榜,把北京大学列到世界第十七位。即使如此,有一个北京大学,或者再加上清华大学或者其他大学,也不能算是强国啊!要成为大国很容易,因为你人口多呗。但是要做强国就很难。所以我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做

大容易做强难”。做强，不能光看有几所“一流大学”，而要看全国高等学校的总体质量，包括正在兴起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要看是否能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需求的应用性、技能型人才。要做强，今后我们的发展任务更艰巨。正因为更艰巨，所以就更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盲目瞎闯很难做强。现在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看法和做法是急功近利，并没有从长远考虑，缺乏审慎的研究和可靠的理论指导。

袁：理论研究非常重要。高等教育如何根据社会急速变化的特点，面向未来，确实很值得研究。

潘：是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种辩证关系，理论既落后于实践又超越于实践。因为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理论不可能走在实践的前面；但是理论如果不能超越实践的话，那么理论就没有意义了。现在我们要很好地从实践中总结出正确的规律性的理论，指导今后的实践工作。我们现在的许多做法，老是违反了我们的理论认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要跟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过去我们高等教育脱离了经济的发展，造成许多损失，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这些问题，到文化大革命时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需要研究教育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如何跟经济的发展相协调，这些都有研究成果的。但在实践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决策，老是置理论于不顾，违反规律办事。有时踏步不前，有时又盲目求快，不顾经济的情况。等到看到不对头了，又来个紧急刹车。1983年、1984年发展得特别快，后来教育资源配合不上来，从1985年降下来。1992年、1993年又发展得很快，每年招生增长了20%；到了1994年就不行了，再增长下去的话，没有校舍，没有教师。1994年、1995年，基本上没有增长，1996年、1997年稍微增长一点点，1998年增长多一点，达到8%；1999年扩招，一下子增长了47%，原因是有经济学家认为，发展高等教育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这也没错，教育应该为经济的发展服务。但是不顾教育自身的条件、自身的规律，行吗？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增长了47%，以后每年继续超常增长，百分之三十几、百分之二十几，一直到去年，2004年还增长了18%，所以现在又出现了问题。还好，这次吸取过去的教训，不是来个急刹车、负增长，而是要控制今年(2005年)的增长率，控制为8%，严格要求各级政府不能突破指标，

否则要严肃查处。为什么会大起大落，就是因为只听经济学家的话，而经济学家只从眼下的经济政策考虑问题。教育事务，为什么不也听听教育家的话呢？其实，教育理论是明确的，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教理论界就提出了“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这几年我国的GDP增长不过7%、8%，最多9%，但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增长每年百分之四十几、三十几、二十几，远远超过了承受力。教育资源的增长同学生数的增长不能够协调、同步。不能够同步的话，就产生了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所以现在就是质量严重下降，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理论不起指导作用，做事违反规律而形成的问题。

袁：您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哪些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潘：这个很难一句话说清楚，因为现在高等教育的问题很多。问题很多是好事情，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在解决问题之中发展的，如果不发展，它就没有问题。

哪些问题特别值得注意，要从不同角度看。从提高质量看，你可能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如何进行德育；从发展来看呢，你可能说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要解决今后大众化可持续发展下去的问题。现在只是大众化的开始，还要继续发展，必须解决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的问题，只靠政府拨款和靠大学扩大规模，就不能有大的发展。你不解决民办高等教育的问题的话，你没有钱；你不解决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话，毕业生就业问题难解决。如果本科都是培养理论性人才，研究生都去培养科学家，中国要那么多的科学家吗？十六大提出来，中国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但还需要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数以亿万计的普通劳动者。有人做过统计，生产上每需要1个科学家，就要有10个工程师，1个工程师就要有10个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当然，这个统计可能与高新科技产业不符，但你如果不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话，大众化就“化”不下去了。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说，当前必须解决的是民办跟高职的问题。所以很难说哪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很难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应该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位校长，你做的是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
4

如何搞好教学和思想道德教育；如果你在教育行政部门，就必须考虑如何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的问题。

袁：您刚才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最近我看到您写了不少文章谈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教育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怎么处理这二者的关系？

潘：大众化教育和精英教育都是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说的。大众化这个阶段里面就存在多种教育，其中就存在精英教育，不能没有精英教育。不能说大众化阶段所有高等教育都只能是大众化的，精英教育将仍然存在而且还要发展，还要提高。即使到了普及化阶段，也是这样。美国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却还有6.6%的研究型大学，不可能都一个样，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在大众化阶段还要建设一流大学，但是不能只是考虑搞好一流大学，不能只考虑少数高校。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能只靠少数拔尖人才。综合国力的加强需要培养科学家，同样需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数以亿万计的高水平的劳动者。有人从事这方面工作，有人从事那方面工作，只有人多人少之分，而无高低贵贱之别。

我们正在实施的“211工程”也好，“985计划”也好，实际上都是邓小平的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时我们中国，打开国门一看，落后于人家至少20年，因此必须抓重点，迎头赶上。现在很多人事后诸葛亮，说不应该搞重点大学啊，不应该发展大学啊，应该从义务教育搞起啊。谈问题不能离开特定的时间、条件。先打好基础，按部就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果先打好基础从义务教育搞起，十几二十年之后再发展高等教育，那是不行的！只能迎头赶上，因此重点大学也好，接着后来的“211工程”、“985计划”，都是要抓重点的，这是一种战略。当然，到了一定时期不能够老是只顾发展重点，还要带动一般。到了一定时候可能不只是“兼顾公平”，还可能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所以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来否定当时的，说当时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当时是正确的，到现在一直就是正确的。当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当时没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公平优先，只能够是低水平的公平。中国过去就是低水平的公平，每一次的农民革命，都是分田、均田，大家平均分配土地，这是低水平的公平

啊。必须提高，提高不可能一下大家都提高水准，只可能有重点地非均衡发展，先着重扶植重点大学。但是作为重点来说，只顾你是重点就沾沾自喜、自傲，正如先富起来的人只顾夸耀自己是富豪，对弱势群体、穷困的人不管，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走共同富裕道路”。现在有条件可以逐步使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了，所以现在提出要全面推进小康生活。过去不敢说全面推进，只能让上海、北京、广东或是江浙，先达到小康，你不能同时讲西部都同步达到小康。到了一定时候，你小康了，应该拉动大家小康。所以现在提的口号是全面推进小康，要建立和谐社会，要重视公平，看事物就是这么看的！

现在如何看“211工程”、“985计划”等等？这些到现在还是有作用的，因为现在还不可能平均使用力量。现在是如何实现兼顾的问题，如何兼顾非重点的院校、专业的发展，而不是取消“211工程”、“985计划”，所有学校都一个样，搞平均主义。重点大学的带头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任何时期都要有带头者。但“211工程”也好，“985计划”也好，它们的缺点是，入围的高校往往不是通过竞争和努力获得的，而是行政指定的。行政指定固然有一定的基础，不是完全没有根基，它是有评估的，评估的客观性如何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往往领导的意志太重了些。这是不是最有利于发展的决策，很难说。这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现在“211工程”还是可以做，“985计划”还是可以做，但是必须注意到要兼顾弱势群体了。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袁：这几年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得非常快，有的地方民办高等教育可能是半壁江山了。您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关注，也非常支持。您觉得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在哪里？如何进一步发展？

潘：昨天我在这里（北京）作的一个报告，就是专门讲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的。我的报告题目是“从宏观环境和国际比较看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中国现在要制定2020年的发展战略，2020年的发展战略包括各个方面，包括刚才所说的建设重点大学，搞一流大学等等，当然还有民办、高职等等。我预测，民办高等教育到了2020年，可能达到高等教育总量的二分之一以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从宏观环境来看，社会对教育发展的要求很强烈。但光靠国家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很难

很难的。1993年国务院同意到2000年，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多少年来都是在2.5%上下浮动，好不容易在2002年达到3.32%，但是到2003年又下降到3.28%，2004年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估计还是差不多，从整体教育经费来说要再增加很难。这个财政问题一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中国的财政制度和国外的财政制度有些不同。即使绝对量会增加一些，增量部分主要也是投在义务教育，投往西部，不可能再给高等教育增加很多投入。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18%左右，这几年因为高等教育发展很快，高教经费已经达到28%左右，所以现在不可能再增加。可是如果高等教育经费既不增加，又要不断扩招，教育质量势必要下降。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民办高等教育。

21世纪以来，民办高等教育正在发展与分化之中。有的民办高校发展迅速，包括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有的则办不下去，停办或被收购了。办得好的民办高校并不是靠高收费（当然收费略高于公办高校，但没有国外私立、公立那样的收费差距），而是靠节约开支与提高效率。学费不能再高上去了，再高上去老百姓负担不起。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的独立学院不是收费挺高的吗？没错，独立学院是高收费的，但是如果独立学院再这样发展下去，也会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在厦门，独立学院学生每年收费（学费和宿费）近2万元，4年8万左右，加上4年中的生活费，少说也得10万。有多少子女考不上公办本科院校的家庭，能付出10万元送子女挤进这种二级的本科院校？2004年249所被批准的独立学院的学生已经有69万了，加上尚未被批准的，差不多将近100万学生了，这就是说要有100万个家庭能够付出巨额教育费用！所以现在有些独立学院，特别是地方公办本科院校所属独立学院已经出现生源不足了，因为它们收费太高了！现在应当大力支持真正的民办高校。这类民办高校一般来说收费比较低——虽然比公办高校收费高一些，但一般一年收费几千块钱，不像独立学院要一万到两万。说到困难问题，现在最大的困难有两点。一是在现行的招生制度下，民办生源质量低、数量不足；二是受到种种限制，筹集资金困难。吸收投资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产权要明确。作为投资者，投到学校去的资金，在市场经济下，理所当然要获得利润。首先要保证产权仍是投资者的，其次要能获利。现实情况是，投资者的产权没保证。为什么说产权没保证？资金投进来以后就不能动，活钱就变成死钱了：你不能够抽回去，抽回去叫抽逃，资金不能抽逃；校舍不能抵押，投资者要投资盖

房子，校舍不能到银行抵押，也不能转让；不能这个也不能那个，投资者的产权基本没有了。虽说是可以适当获得回报，但回报多少？到现在不清楚。原来预计《民办教育促进法》公布后，会有更多的投资者，结果呢？这两年除公办二级学院(独立学院)外，投资不见增长，人家不敢来投资。现在关键问题在于政策不配套。政策为什么不配套呢？还是观念问题。

国务院2005年5月第三号文件强调，要引进非公有制的资金进入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等各个事业领域。卫生医疗这方面很积极地在做，但是教育这方面还没动。教育这方面为什么没有动呢？因为老是有这个思想，认为教育是福利事业、公益事业。如果允许赢利就是破坏了福利性、违反了公益性。这实际上还是公与私的对立思想。教育法规定办学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是正确的，但投资者以营利为手段行不行？你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众所周知，公办、民办，都在营利(创收)。由于不承认产业化运作，不承认营利行为，对营利行为缺乏规范，导致实际上大量不规范的营利行为出现，包括教育乱收费。

总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发展民办教育；要发展民办教育就必须能够从社会筹集资金；要从社会筹集资金，就必须产权明确。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集中于研究教育产权问题，包括研究高等教育怎么样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有人说研究这个问题很荒谬：教育是神圣的，神圣的教育讲什么资本市场啊？我们中国人一讲到钱就觉得庸俗不堪。但是，你要不要面对市场经济？你要不要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你要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你就不能够老是那么清高。不过，办教育的目的要明确，福利是目的，公益是目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运用市场这个手段，来达到公共福利、办好公益事业的目的。这是我的看法。

袁：现在不少大学提出要创建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创建一流大学？

潘：一流大学有没有标准？现在所谓一流大学也就是世界排行榜——或者更具体地说主要是美国排行榜，再加上英国排行榜——按照他们的标准来排名。排在前面50名或是100名的大学叫做一流大学。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些学校确实是不错的，但是你看看这些一流大学大概都是什么学校啊，都是综合性、研究性的学校，如果全世界的大学都去办成综合性、研

究性的，都是走一流大学的路，都去培养科学家或什么什么家的话，将来谁去第一线干活啊？当然，我们中国要有这种一流大学，清华、北大就去干吧。但是不能把所有的地方大学都往这方面激励。我的观点是，一流大学要多样化，有综合性的、研究性的一流大学，也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类大学。解放前就有不少在国内著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专科学校，如杭州艺专、上海商专、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流大学应该是多样化的。至于是不是要跟国外去比，这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国外有些很好的大学并不排名在一流大学里面，但人家培养的人才也是一流的。

袁：您毕生都在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管理，您对大学校长、大学管理者最主要的建议是什么？

潘：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校长，但是才能很难得到发挥。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前产生过不少有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后来好像大学校长中没有那么多教育家了。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在办学中将理念转化为实践。现在不太可能，无论是重点大学或一般地方大学，都要按一个模式办学，符合于统一的评估体系，忙于“迎评”活动。这些校长有什么教育理论、有什么创造性，能付之实践呢？我并不一概否定评估，对于新办校的合格与否，评估有一定把关作用；对于有创新、有特色的大学，按一定的框框评估，只能起限制作用；对于单项活动，如体育是否达标、仪器设备是否够用，评估有一定的作用，对于综合评估，则评不出特色。

这样的体制下面，我们的校长能干什么呢？只能在种种繁琐的规定中，在一个桌面上跳舞，只能够在桌面上跳得好一点或者跳得差一点，你没办法去地板上跳。民办学校呢，它们范围大一点，它们可以在整个房间里跳，但是也跳不到外面去。当然也不能让它们乱跳。怎么做合适？政府完全不管不行，但我们现在的的确确很多东西限制得太死，不该管的事情管得太多。这样，校长还能有创造性，还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吗？

袁：您对高等教育研究有些什么建议？

潘：高等教育研究，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背景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

的问题很多。问题多是好事，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前进的。没有改革就不会有问题，一潭死水就不会有前进。我们就是为研究高等教育理论问题，解决高等教育实践问题而工作的。没有问题，我们不就失业了吗？形势大好的标志是每年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以万计，出版的专著数以百计，高等教育学和以高等教育管理为主的教育管理学科专业点近百个，每年培养的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生数以千计，正如一位外国同行专家所赞叹的：“中国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但我们还远不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关于如何向高等教育研究强国发展，我有两点建议：

(一)高等教育学，就其总体上说，是应用性学科。当然，应用性学科也有应用性的基本理论研究，有的研究成果还能够补充教育学研究之不足，提高教育学的理论水平。但大量的应当是从宏观或微观层面上解决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包括近来所提倡的“校院研究”或“校本研究”。例如，每年有数以千计的高等教育学科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某篇论文能解决某个实际问题就有意义、有贡献，而不必都去做空空洞洞、东抄西摘的大文章。

(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与发展的。在其产生的早期，由于信息闭塞，对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情况和研究成果知之不多，因而视野不够宽阔，理论水平不高。后来国际学术交流增多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这对学科的建设与理论水平的提高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当然，也有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之后才开始研究的，如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评估等等。但大量的研究课题是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出发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带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但在“与国际接轨”的倡导下，有些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认可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呈现出一定的主体迷失，盲目地追求理论和方法的国际“时尚”和“潮流”，成为“依附理论”的追随者。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只能仰仗于西方理论的“辐射”，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只能被边缘化。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应当克服“民族本位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倾向，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

袁：谢谢！

代序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历史、现实和未来^①

代
序

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数量庞大的高等教育大国，而且是一个新兴的“高等教育研究大国”。中国的高教研究虽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起步较晚，但发展相当迅猛，目前已成为中国教育科学中最具活力，研究机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本文试图沿着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线索，简要地回顾中国高教研究的演进轨迹，考察中国高教研究的现状，并展望 21 世纪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使国际学术界能更多地了解中国高教研究的情况，并关注未来中国高教研究的进展。

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一)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溯源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发轫于清末洋务学堂，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也从那时就开始了。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盛宣怀等，以及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等，都曾提出过若干关于高等教育目标、学制、留学教育的主张。进入民国以后，随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教育界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问题。例如：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浙大校长竺可桢等都发表过许多大学办学的见解。蔡元培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这位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曾留学欧洲的杰出教育家，担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不少重要的高等教育思想。

^① 本文英文稿发表在：Change: Transformation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ydney Vol. 5, No.2, November 2002, 与李均、陈小红合作。